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1-0064-06

一部主题复杂而深刻的失败之作

——评徐则臣长篇新作《王城如海》兼议其近年的一个写作倾向

杨希帅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徐则臣长篇新作《王城如海》的主人公余松坡是一个具有多重所指的能指符号,他的存在使这部小说的主题显得异常复杂而深刻。但是,小说情节的戏剧化和细节的不真实,使得《王城如海》成为一部艺术上的失败之作。而小说艺术上的失败与徐则臣近年来过度追求宏大叙事,却相对忽视小说艺术真实的创作倾向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徐则臣;王城如海;宏大叙事;艺术真实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1.11

一、有难度的写作与未完成的创作目标

在当下的青年作家中,徐则臣以对现实社会的正面强攻著称。《跑步穿过中关村》、《三人行》和《啊,北京》等北京系列小说聚焦于生活在北京边缘的京漂一族,为北京这一地域空间的文学书写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使他成为继邱华栋之后新北京书写的代表人物。同时,由于他的北京系列小说触及了京漂这一“流动的底层,非法的底层和另类的底层”^[1]。因此,在批评家李云雷看来,他的这类小说也可以纳入到新世纪底层文学中考察。可以说,正是北京系列小说为徐则臣在文坛上赢得了盛名。于是,在完成历时六年之久写就的《耶路撒冷》之后,徐则臣再次把笔触伸向了北京,他要写一部以北京为主人公的小说。这部以北京为主人公的小说便是长篇新作《王城如海》。

与以往的北京系列小说相比,《王城如海》有不少新变。诚如徐则臣所言:“我开过一个玩笑:

很多人说我写‘北京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这次要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让他们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场;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出口转内销,沾点‘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气,从世界看中国;过去的北京只是中国的北京,这一次,北京将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标里的北京。”^[2]从这段作者自述中可以看出,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为自己树立了不小的创作目标。这一创作目标既有人物形象的变化,从北京的非法边缘人物一变为留学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审视北京视角的扩大,从以往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框架内来看北京,一变为引入域外的视角,在全球化的坐标中观察北京。当然,人物形象的变化与审视北京视角的扩张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审视北京视角的扩张必须依赖人物形象的变化,只有人物形象自身的视野足够宽广,才能在全球化的坐标中去看北京。

显然,从徐则臣的创作计划来看,《王城如海》

收稿日期:2017-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ZW01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G031)

作者简介:杨希帅(1990—),男,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本文信息:杨希帅.一部主题复杂而深刻的失败之作[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1):64-68.

是一部有难度的小说。但是,从《王城如海》这部小说文本来看,徐则臣并没有完成这一有难度的写作,他没有实现自己的创作目标。和徐则臣的创作计划一样,《王城如海》的主人公余松坡是一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先锋话剧导演,既有丰富的异域生活经验,又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审视精神。如果充分发掘和利用余松坡这一人物特性的话,完成可以达到作者审视北京的写作目标。然而,由于作者让余松坡这一人物置身在复杂的社会结构网络中,使得他的多重身份具有了多种社会内涵。于是,在余松坡与其周围人物的关系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大众,中产阶层与底层民众等多种矛盾关系。可是,小说情节的戏剧化和细节的不真实,最终又一一消解了余松坡这一人物形象的丰富内涵。所有这些导致《王城如海》成为一部创作目标巨大,创作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的失败之作。

二、余松坡与文本复杂而深刻的主题意蕴

徐则臣是一个对文学地理空间非常敏感的作家,他在从事写作伊始,就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构造了两大空间:北京与花街。这两大文学空间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它们为徐则臣观察乡村与城市提供了对照。也许是意识到仅仅在中国内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框架中书写变动的社会现实的局限,从短篇小说《古斯特城堡》开始,徐则臣有意识地引入了异域空间。借助异域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的现实。对于异域空间的引入,最成功的即是《耶路撒冷》。徐勇说:“‘耶路撒冷’只是作为远景(目标)出现,这一‘缺席的在场’影响着置于前景的主人公的行止。”^[3]到了《王城如海》,对于主人公余松坡而言,异域空间不再仅仅是其活动的远景,而是他身处其中的生活空间,成为他生活经验与生命经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拥有实在的域外生活经验,使得余松坡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极其复杂起来。

作为一个留学海外,并在海外生活多年的戏剧学者,作家和导演,余松坡是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以一个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知识分子的视角来观察北京,这样的观察结果必然会被放置在中西之间,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之间的框架内部被审视和质疑。这不难理解,海外知识分子由于缺乏在中国本土生活的经验。因此,他们在观察

中国的时候相对容易从西方视角来观察中国。于是,其观察结果往往与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相隔膜。而知识分子的启蒙视野则会导致他们在观察现实境况时相对会比较夸张,对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缺乏理解与同情。也许正是出于对上述情况的考虑,《王城如海》中的余松坡觉得自己虽然多年生活在海外,但是“他确信,二十年来他在纽约的网络上读到的中国报纸不比任何一个待在国内的中国人少。”^[4]以此来为自己能够正确理解中国 and 北京做辩护。不过事与愿违,当他回到中国之后,“他不仅没能艺术地思考和处理好复杂的现实,他的艺术也被现实弄得无比复杂,难以把握。”^[4]这里需要提到的就是余松坡回国后创作的戏剧《城市启示录》。在余松坡看来,他借助这部先锋戏剧表达了他对北京的观察。然而,由于《城市启示录》中显露出对“蚁族”的歧视,结果导致了青年人广泛的抗议。显然,《城市启示录》的作者对“蚁族”生活是一种知识分子俯瞰式和启蒙式的观察,因此他只能看出“蚁族”生活的卑琐与平庸,却看不出青年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对生活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使得高级知识分子余松坡对“蚁族”现实生活的把握恰恰是反现实的。从这个角度看,余松坡与青年学生围绕《城市启示录》的争论与辩驳凸显出的其实是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之间的隔膜。因此,当从海外知识分子角度来看余松坡这一人物形象时,他身上显示的是海外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的隔膜这一境况。

在一篇访谈文章中,徐则臣谈到故乡之于个人的精神意义,他说:“我们总认为世界在故乡之外,但当我们心智成熟到一定程度,当我们的阅历和见解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对故乡尤其是心灵之故乡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后,世界为什么就不能在故乡之中呢?于坚守故乡者而言,世界在故乡之外;对身居世界的游子,故乡可能就成为真正的世界。”^[5]在这里,徐则臣深刻地阐释了故乡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即对于身在故乡之人,世界在故乡之外;对于远离故乡之人,故乡就在世界之中。如果说,徐则臣早期的北京系列小说极力描写的是身在故乡之人努力挣脱故乡,走向世界的历程。那么,从《耶路撒冷》开始,他着力书写的则是走向世界的人永远无法摆脱故乡记忆的宿命感。这种无法摆脱故乡记忆的宿命感在《王城如海》中的余松坡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固然,在《王城如海》中,余松坡是一位有着多年海外生活经验的高级知识

分子。但是,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个从农村底层通过艰苦奋斗而一步步走向成功的人。因此,余松坡有着灰暗的农村底层生活经验。而这种底层生活经验又以某种原罪的方式留在余松坡的记忆深处,使得他无论身在何处,始终摆脱不掉。具体来说,就是在余松坡与堂兄余佳山竞争进城当兵名额时,余松坡诬告余佳山在北京参加过反动活动,致使余佳山蒙冤入狱十五年。并且,在监狱服刑期间,余佳山精神失常,成为疯子。这件事情成为余松坡内心的原罪,它一直在折磨着余松坡的精神,使他得了无法治愈的梦游症,只能依靠《二泉映月》来缓解精神的焦虑与不安。在这里,余松坡无法治愈的梦游症当然可以在现实层面上理解为他为堂兄余佳山的愧疚、忏悔与心灵自责。同时,也可以解读为故乡记忆与个人存在的精神寓言,即无论个人走向何处,故乡都是其无法摆脱的精神记忆。毕竟,对于任何人,故乡都是一个人走向世界的原点与来路。而只有明白自己人生的开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余松坡的人生经历既体现了乡村与城市的结构关系,也深刻地说明了故乡记忆与个人存在的精神联系。

无疑,高级知识分子余松坡是《王城如海》的主人公。但有趣的是,小说中除了余松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知识分子了。相反,围绕余松坡日常生活的是一群底层小人物,比如保姆罗冬雨,快递员韩山,“蚁族”大学生罗龙河。这显然是两个阶层的人物,余松坡是城市中产阶层的代表,罗冬雨,韩山和罗龙河是底层民众的代表。徐则臣将这两个阶层的人物放置在一个小说文本内,应该是第一次。他的写作意图是什么呢?从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作家可能希望借此展示一下城市社会中的阶层冲突。罗冬雨是余松坡家的保姆,由于这层关系,罗冬雨的男朋友快递员韩山,弟弟“蚁族”大学生罗龙河和余松坡建立了关系。但是,当罗龙河的女朋友为了出演余松坡的话剧主动向余松坡投怀送抱后。罗龙河便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报复余松坡。终于在一次帮助姐姐整理余松坡的书架时,发现了余松坡的遗书,从而获知了余松坡陷害余佳山的秘密。之后,他便引来余佳山到余家,给余松坡带来精神和身体极大的伤害。因此,从余松坡和罗龙河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

以上是建立在承认《王城如海》艺术上成功的前提下对主人公余松坡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通过这种人物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让余松坡背负了过多的意义,这使得余松坡成为一个多重所指的能指符号。当把他作为一个海外高级知识分子来看时,他显示的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的隔膜这一境况。当他成为从农村底层走向世界的成功人士时,他的人生经历则体现了乡村与城市的结构关系,说明了故乡记忆与个人存在的精神联系。当他作为城市中产阶层代表时,他与周围底层民众的冲突,又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城市社会中的阶层冲突。显然,《王城如海》在主题上异常“深刻”和“复杂”。或许正是主题上的“深刻”和“复杂”为它赢得了不少批评家的赞美。刘琼说:“徐则臣这部小说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写出了知识分子精神内在的反省和批判,表现为道德的重负和自律。”^[6]谢尚发则把《王城如海》看做是“现代版的‘北京风物志’”。^[7]刘永春就认为:“《王城如海》是对当代城市生活及其日常悲剧性的最佳体现,而雾霾则象征了余松坡的精神困境,也象征了这个时代的总体处境。”^[8]如果从上述批评家对《王城如海》主题意蕴的揭示来看,那么徐则臣的这部长篇新作无疑完成了他计划中的有难度的写作。但是,仅仅从主题意蕴上来判断一部小说的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一本小说都会有自身的主题内涵,有时候就是一本三流小说也可能会有丰富的内蕴。而批评家如果想要开掘作品的内蕴,总能发现作品在主题上的一些重要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小说主题上的“深刻”和“复杂”是否能够经得起艺术上的检验。

三、小说艺术的失败与追求宏大叙事的创作倾向

在《王城如海》中,导演余松坡与青年“蚁族”们的矛盾来源主要是戏剧《城市启示录》中对“蚁族”的轻视。为了加强双方矛盾的紧张性,徐则臣在小说中极力渲染《城市启示录》的轰动效应和青年人的强烈反应。于是,小说中出现了余松坡不断地召开包括媒体记者在内的剧本修改研讨会,还有青年学生在网上和现实中声讨导演余松坡的情节。这样的情节安排看似合情合理,但是细想会觉得这些情节并不真实。也就说,小说中安排的这些情节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中根本就不可能发

生。首先值得怀疑的便是,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一部先锋戏剧可能会引发全民关注吗?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便是,近二十年来,剧场艺术在市场上一直处于弱势。尤其随着电影和电视的发展,戏剧观众流失更加严重。因此,现实社会中几乎很少会产生一部引起全民关注的戏剧作品。而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却大写特写先锋戏剧《城市启示录》如何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以至于导演余松坡为了迎合观众,一会儿开会修改剧本,一会儿考虑换演员,一会儿又是实地考察“蚁族”生活。这样煞有介事地铺张叙写,反而会使小说情节更加不真实,也让读者觉得写得刻意而做作。其次就是,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一再提到青年人对《城市启示录》的情绪化反应。由于《城市启示录》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于是他们成为了反对和批评这部戏剧的主力军。这里显然是在突出当下青年人对个人自尊的重视。但是,如果想到80后和90后这两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一种充满解构意味的后现代文化教育。他们怎么可能在意一部戏剧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场景呢?更何况,这是一代勇于自嘲的青年。当面对自身的尴尬处境,他们很少正面触及,往往用自嘲来消解尴尬。这使得他们绝对不会把别人几句并非故意伤害自己的话放在心上。所以,从对当下青年人个性的认知来看,《王城如海》中对青年人的描写是相当不真实的。既然戏剧《城市启示录》在当下社会不可能产生轰动效应,青年人也不可能为几句伤害自尊心的话而大动干戈,那么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结构的导演余松坡与青年人的矛盾关系便会自动取消。而一旦双方矛盾关系取消,余松坡作为一个对中国现实隔膜的海外知识分子的形象便失去了现实的依托,变得不再真实。

徐则臣并不是第一次书写忏悔和原罪主题,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们就是背负着对童年玩伴景天赐的原罪而一一返乡的。他们一直正视着自己的原罪,试图解决自己内心的精神困苦。与初平阳们不同,《王城如海》中的余松坡却是一个一直躲避自己原罪的人,他甚至失去了忏悔的能力。如果说在他生活在海外的那些年里,由于他没有当面向堂兄余佳山忏悔的机会,来弥补自己的罪过。这情有可原。但是,当他回到北京,在天桥上明明认出了流浪汉余佳山,却依然拒绝忏悔。不仅不忏悔,相反他选择的是躲避余佳山。这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因为二十年来折磨自己的

不就是对余佳山的原罪吗?现在有一个机会,既可以向受害者忏悔,又能减轻自己的罪感,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显然,余松坡的行为不合生活的情理。这说明他并不具有学者刘再复所言的“良知意义上的自我审判”式的忏悔意识,他没有真正承担起自己对余佳山的责任。因为在刘再复看来:“忏悔实质上是良知意义上的自我审判。未经良知审判的自我,处于傲慢、迷失与忘记责任的状态中。自我被欲望引导四处奔突,不知走向何方。不论自我身处何方,它都未曾意识到自身,这时候的自我是一个完全迷失的自我。这个自我常犯的错误就是反认他乡是故乡。良知发出呼声,将自我唤上前来,让它作自我对话,让傲慢的变得谦虚,让迷失的清醒过来,让忘记的重新回忆起来,把‘忘记了的’责任重新拾起,让自我再寻找它应该走的路。”^[9]既然余松坡面对余佳山,无法背负起自己的责任,那么徐则臣在小说中写到的用来缓解余松坡梦游症的《二泉映月》和余松坡被误诊为癌症后写的遗书的情节便有些多余。同时,这些情节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也显得有点故弄玄虚。所有这一切也使得把余松坡无法治愈的梦游症解读为故乡记忆与个人存在的精神寓言的说法不再有效。

徐则臣试图通过余松坡与罗龙河的矛盾冲突展示都市社会阶层冲突的风景。但是,余松坡和罗龙河的冲突很难构成阶层冲突。因为在小说文本中,两人的阶层关系并不突出。小说更突出的是青年戏剧爱好者和著名导演之间的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罗龙河把余松坡视作自己的精神偶像,从各个方面向余松坡学习。因此,罗龙河几乎没有从阶层出身上来比较过自己和余松坡的区别。从这个方面来讲,把余松坡和罗龙河之间的冲突作为阶层冲突来看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到此为止,余松坡作为一个多重所指的能指符号,其所指含义被一一解构了。换句话说,余松坡身上背负的过多的意义经不起艺术层面的检验。这使得《王城如海》这部看似主题意蕴十分“复杂”和“深刻”的小说最终成为一部野心极大的失败之作。说它是一部失败之作,主要原因就是密布在小说中的主题缺乏丰富而真实的情节和细节做支撑。而如果细究《王城如海》艺术上的失败,与徐则臣近年来过度追求宏大叙事的创作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

作为70后作家的一员,徐则臣对宏大叙事有

着自觉的追求。在《别用假嗓子说话》一文中,他说:“‘70后’整体上宏大叙事野心的欠缺,在当下史诗成癖的文学语境里,是大大减了分的。我听到很多前辈为此忧心忡忡,语重心长地提醒:砖头、砖头。”^[10]从徐则臣这句不无忧虑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中追求宏大叙事的紧迫感。事实上,近十年来,徐则臣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努力追求宏大叙事。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7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史”^[11],实现了其书写宏大叙事的目标。但同时,《耶路撒冷》也暴露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为了从整体上把握70后一代人的成长经验,过于依赖代际视野,却有意忽视和牺牲代际内部的差异。并且,由于刻意突出代际特性,把一些本来是普遍性的经验硬是作为特殊性进行处理。只是,由于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于情节和细节上下足了功夫,使得上述缺陷并不是过于突出。而到了《王城如海》,徐则臣虽然延续了主题先行的写法,并且主题又都是宏大主题。但是由于写作仓促,使得在结构小说时大量情节与细节无法支撑起小说主题。这就必然使得《王城如海》最后成为一部失败之作。因此,对于徐则臣来说,应该反思的不是要不要写宏大叙事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坚持宏大叙事的同时,重提现实主义的命题。不能为了宏大叙事,而放弃小说情节和细节的真实性。只有做到兼顾宏大叙事和艺术真实,小说才能成为有艺术价值的“深刻”与“复杂”之作。否则,无论小说主题多么宏大,其在艺术上依然是失败的!

参考文献:

- [1]李云雷.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
- [2]徐则臣.《王城如海》后记[J].东吴学术,2016(5):16-20.
- [3]徐勇.全球化进程与一代人的精神自救——评徐则臣长篇新作《耶路撒冷》[J].当代作家评论,2014(4):134-138.
- [4]徐则臣.王城如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 [5]游迎亚.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5(3):112-116.
- [6]刘琼.徐则臣的前文本、潜文本以及“进城”文学[J].东吴学术,2016(5):21-25.
- [7]谢尚发.撕裂的城市风物观察——评徐则臣《王城如海》[N].文学报,2016-08-25.

四、追求一种富含日常性生活经验的宏大叙事

徐则臣早期的小说往往能够以小见大,写得扎实而深刻。比如《伞兵与卖油郎》,作为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小说完成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叙事。然而,故事的结尾却是,执着于做伞兵的范小兵最后成了一个瘸子,一个卖油郎。于是,在一个不长的篇幅里,有论者认为小说“通过一个孩子的悲剧,抵达人类共同的悲哀”。^[12]但是,近年来他的写作逐渐偏离了微观写实的轨道,过度追求宏大叙事的构造。结果,一部主题复杂而深刻的《王城如海》成为了一部艺术上的失败之作。事实上,过度追求宏大叙事,忽视小说艺术真实的创作倾向普遍存在于70后和80后作家的创作中。如果细读这批作家最近几年引起轰动的几部“史诗性”作品,比如乔叶的《认罪书》,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和张悦然的《茧》,会发现作品在情节逻辑上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宏大叙事所构造的主题意蕴,比如王达敏认为乔叶的《认罪书》是一部“要义明确而思想混乱、文本逻辑与作者意图严重背离、作者及隐含作者以代言人角色强行登堂说教的小说”。^[13]因此,对于徐则臣这样的青年作家来说,在书写宏大叙事时,应该顾及日常性生活经验的真实可感。也就是说,他们或许应该追求一种富含日常性生活经验的宏大叙事。如此,他们作品中的宏大叙事才会产生落地感。

- [8]刘永春.时代焦虑的即时书写及其诗学进展——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观察维度[J].扬子江评论,2017(3):73-77.
- [9]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 [10]徐则臣.别用假嗓子说话[N].文学报,2011-10-17.
- [11]杨希帅.出走与回望:一代人的成长史——读徐则臣《耶路撒冷》[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20-124.
- [12]邵燕君.徐步向前——徐则臣小说简论[J].当代文坛,2007(6):25-28.
- [13]王达敏.被“平庸的恶”绑定的小说——乔叶长篇小说《认罪书》批评[J].文艺研究,2015(2):23-29.

(下转第80页)

- 技,2016(19): 30-32.
- [14]胡霞,丁浩.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CHIPS 8000 农户数据[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5): 17-25.
- [15]邵爽.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研究——基于就业与保障视角[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111-118.

Human Capital, Social Security and Farmers' Land Circulation Behavi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P 2013

You Wei, Zheng Yifang, Xu Jiaxi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d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capital, social security and their land circulation behavior based on the 2013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survey data (CHIP2013), by applying Logistic and OLS regression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among various factors of human capital, the farmers' education degree was not obvious for them to transfer land, but it could promote the land transfer households to transfer out more land. Healthy farmers were willing to turn into more farmland. Farmers involved in pension insurance were willing to transfer more land; farmers enjoyed subsistence allowances and social relief or labor insurance benefits were reluctant to transfer their land; participating in medical insurance, farmers were willing to transfer more land. Correspondingl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t the end.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social security; land circulation behavior

(上接第 68 页)

A Complex and Profound Subject but a Failure: Comment on Wangchengruhai by Xu Zechen and His Writing Tendency in Recent Years

Yang Xishua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Yu Songpo, the hero in Xu Zechen's new masterpiece Wangchengruhai, is a symbol of multiple signs, whose presence makes the theme of this novel very complex and profound. However, the dramatic novel plot and the untrue details make the novel an artistic failure. The failure of the novel reflects Xu Zechen's over-pursuit of grand narrative in recent years but neglect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rt and reality in novel writing.

Key words: Xu Zechen; Wangchengruhai; grand narrative; artistic truth